

大正文化 帝国のユートピア

大正文化

帝國的
日本的
烏托邦時代



Takemitsu Taniho
竹村民郎 著
林邦由 譯

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竹村民郎
著；林邦由譯。-- 初版。-- 台北市：玉山社，
2010.12
面：公分
ISBN 978-986-6789-86-1（平裝）

1. 日本史

731.276

99021241

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作 者／竹村民郎

譯 者／林邦由

發行人／魏淑貞

出版者／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45號3樓之2

電 話／(02) 27753736

傳 真／(02) 27753776

電子郵件信箱／tipi395@ms19.hinet.net

玉山社網站網址／<http://www.tipi.com.tw>

郵 撥／18599799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主 編／蔡明雲

編 輯／林邦由、許家旗

行銷企劃／楊杰龍

業務行政／林志亮

法律顧問／魏千峰律師

排 版／極翔企業有限公司

印 刷／松霖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2010年12月

定 價／新台幣380元

TAISHO BUNKA – TEIKOKU NO UTOPIA by Tamio Takemura

Copyright © 2004 Tamio Takemur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by Sangensha Publishers Inc., Tokyo

This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angensha Publishers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pei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14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大正文化 帝国のユートピア

大正文化

帝國日本的
烏托邦時代



Takemitsu Tomio
竹村民郎
林邦由 譯

導讀

陳慈玉（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這是本非常讓人深思而有所啟發的書，作者竹村民郎長期從事日本大正時期（一九一二—一九二六）的研究，著作頗多。雖然大正時期只有短短十五年，但卻是日本經濟成長非常迅速的關鍵時刻。因為經濟的發展，所以基礎建設興盛，從而影響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與思想，形成「大正文化」。本書作者以銳利的視野指出當時日本人生活水準的變化；亦即鉅細靡遺地從各種角度，描繪普通日本人在思考模式、教育、食衣住行、媒體、性慾等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各種面向。

就歷史的延續性來看，此時期的繁榮是自治治中期發展而來的。一八八〇年代後期所開始的日本近代經濟成長的特色，是近代產業和傳統產業的相互配合發展，以及輸出成為經濟成長的原動力。相對於幕府「鎖國」時期國際貿易的不被重視，十九世紀末葉所呈現的國際貿易顯現出多姿多采的一面，此型態一直影響到現在。換言之，日本早在一百年多前，即奠定了以國際貿易為經濟成長的基礎。而此後的發展則與世界經濟息息相關，此世界經濟不但指歐美先進國家的經濟，並且包括亞洲經濟，亞洲經濟中則分為東南亞、印度為主的經濟以及中國大陸、

台灣和韓國為中心的經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日本出口的成长因素為：日幣的下跌，世界物價的上漲、歐洲和亞洲市場的需求增加。利用此條件，代表近代產業的棉紡織業和代表傳統產業的製絲業都逐漸因此改變生產組織而發展。這種近代產業和傳統產業的平行發展，從貿易結構的角度來看，具有自後進國轉換至中進國的特徵。亦即當時日本從歐美輸入資本財，而把資本財和工業產品輸出到其他亞洲國家，成為「亞洲的工廠」。

大正初期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爭使國際經濟為之一變。一言以蔽之，原來的多角貿易結構產生變化，為日本經濟帶來龐大的海外需求市場，而對正在萌芽的重化學工業而言，由於歐洲的輸入斷絕，不必再面臨國際產品的市場競爭，此隔離效果乃促使重化學工業能迅速成長，海運與貿易業更在此時扮演重要的角色。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世界的生產和貿易都急速成長，製造業的產量、貿易數量和價值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即較一八八〇年代初期擴大了約三倍，世界貿易結構也因此發生變化。

第一個顯著的變化是英國在世界經濟的地位相對地下滑，而美國的地位則上昇。例如英國在世界工業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自一八八一～八五年年平均二十六·六%下跌到一九一三年的十四%；而美國則自二十八·六%上昇到三十五·八%。世界貿易總值方面，英國所佔的比重

亦減小，自一八八一—八五年出口的十六·七%和進口總值的二十一·三%，變為一九一三年的十三·一%和十五·二%。美國則大致不變，比重約維持在出口十二%和進口八·六%左右。但不可否認的，即使在工業生產方面，英國逐漸被當時的新興工業國（美、德）所追逼，但由於擁有壓倒性優越的海運力和金融力，英國依舊是世界貿易的中心。例如一九一一年英國及其殖民地的商船總噸數高居世界的三十九·一%，遠超過德國的八·七%和美國的二·五%。

第二個明顯的變化是很多低度開發地區逐漸被正式統合進入世界經濟。加拿大、澳洲、亞洲、非洲、南美洲等地區，大多是依存農牧產品輸出到先進國的貿易結構，例如南美阿根廷的小麥、玉米等穀物和肉類的出口急速增加，非洲埃及的棉花，和亞洲印度的棉花、茶的輸出的擴大。

總之，此時由於鐵路和海運的發達，以及蘇伊士運河開通，電氣通訊網的發達，運輸大量的輪船出現，使世界上的生產部門和消費部門能經由國際交通網和資訊網而相互連結，進而工業生產力的擴大影響彼此。而鋼鐵業能夠大量生產鋼條，以供鐵路、造船之用；農牧產品也因冷藏冷凍技術的發展而能長距離運輸，這些技術革新的存在，亦助長了國際商品的交換，擴大了世界貿易量。

在這種世界貿易網中，亞洲雖然處於邊陲地區，但卻獨自發展出亞洲內部的貿易，成為日本貿易發展中非常重要的地區。在一八八三—一九一三年間，世界輸出入的成長率是三·四%

和三·二%，亞洲對歐美的輸出入成長率為三·二%和四·四%，而亞洲內部的貿易成長率則高達五·七%和六%。

再者，亞洲內的貿易在一八八〇年代以前是以印度出口到中國的鴉片為主，而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則發生變化，以棉花、棉紗的交換為洲內貿易的主體。換言之，由於印度近代棉業和日本近代棉業的相繼發展，商品作物的棉花栽培、近代紡紗業和傳統織布業能藉著貿易而相連結，亦即：印度和日本棉紗輸往中國和東南亞，當地織戶再織成布供給洲內消費；印度棉花則不再以歐美為主要市場，由一八九〇年約六十八%輸往歐美，轉變為一九一三年四十一%供國內消費，二十八%出口到日本。而亞洲對歐美出口的增加（自一八八三年佔世界貿易總值的一·九%擴大到一九一三年的四·一%），更成為刺激亞洲內部貿易的契機，因為對歐美輸出的增加，使亞洲從事生產商品者的所得增加，結果對米、糖、雜貨、棉布等亞洲內部消費商品的需求亦增加，於是，日本成為這些「亞洲型商品」的供給者。

日本貿易的發展遠超過世界貿易發展的速度，在一八八五、一九一三年，日本輸出、輸入的成長率年平均為十一·二%和十一·三%，因此日本在世界貿易中的比重自〇·五%左右（一八八五年）上昇到二%（一九一三年），而在亞洲內部貿易的比重，亦自一八八三年的四·二%（輸出）和六·三%（輸入），明顯變為一九一三年的二十四·一%（輸出）和三十·五%（輸入）。

就日本國際貿易的市場結構而言，在出口方面，一八八五年時亞洲佔二十六·五%，美國的比重為四十三·六%，歐洲則為二十七·九%；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一九一三年，亞洲比重上昇至四十三·七%，美國和歐洲則下跌到二十九·二%和二十三·二%。美國之比重所以一直比較高，是因為日本生絲的出口在此期間扮演重要角色的緣故。而亞洲比重的上昇則與日本近代棉業的發展與棉織品的輸出有關。

其次，在進口結構方面，一八八五年時，亞洲佔三十四·七%，美國和歐洲的比重各為九·五%和五十五·四%；到一九一三年時完全改觀，亞洲和美國的比重提高到四十七·七%和十六·八%，歐洲則下降至三十·二%。亞洲比重的上昇，是因為日本棉業發展所導致的印度棉花的進口；美國的情形亦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棉花為高支紗所需要，印度棉花則為供給低支紗的原料，亦即此時日本棉業已大為進步，可以紡成技術難度較高的高支紗，從而原料棉花的來源亦呈多樣化。而從歐洲所進口的一直是工業化所必須的資本財，尤其是機械類。

總之，如果以地區來分析大正時期日本貿易的結構，則可分為三個環節：

- 一、美國和西歐（對先進國圈的貿易）
 - 二、東南亞、非洲、中南美、大洋洲（對後進國圈的貿易）
 - 三、朝鮮、台灣和中國大陸（對殖民地圈的貿易）
- 三環節的貿易，在二十世紀初期日本貿易體系中的意義如下：日本對第一環節輸出傳統工

業產品（如生絲、茶），而輸入近代工業品（棉織品、毛織品、機械）；對第二、第三環節則出口近代工業品（如火柴、洋傘、鐘錶及雜貨、絲織品、煤炭、棉織品）而進口原料和食糧（如棉花、豆類、鐵礦石）。但第二、第三環節並不是單純的並存而已，它們相互結合，形成支撐日本產業化的「中進國」型的貿易結構，此結構到一九三〇年代，更進一步推進了重工業化，而「三環節」的角色與特徵亦更加明顯。

另一方面，在大正期間，日本產業結構也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日本工業發展的重心是勞力密集的傳統工業與輕工業。大戰的爆發使原來的世界貿易結構發生變化，從而為日本巨大產業（重化學工業）帶來成長的條件。原因如下：（一）由於船舶不足和海難增加，使海上運輸力急速降低；（二）原本供給資本財給世界的歐洲成為戰場，使歐洲反而極需軍需品及其他工業產品；（三）於是，美國成為主要的物資供給基地；（四）結果，美國經濟非常景氣，使日本和東南亞各國得以增加對美國的特產品輸出；（五）因此，日本不能再仰賴歐洲的重化學工業產品，本國的巨大產業乃得以在無國際市場競爭的情形下成長。

首先，海上運輸力的低減，意味著歐洲海運業的後退，此情況和海外需求的增大，使海運費上昇，於是以日本郵船為主的海運企業獲得巨利，得以擴大事業。因此，產生對船舶的龐大需要，從而造船業的設備投資增加，船舶製造量亦增，而對最重要的材料的鋼材的需求更益迫切。

日本造船所於是向英美等國預約鋼材，但兩國已無輸出餘力，海上運輸亦受限制，乃產生

了鋼材不足的問題。於是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鋼鐵價格暴漲，利潤上昇，利之所趨，除了既有的企業擴張設備之外，更多的工廠加入此行列，並且形成令人注目的「垂直整合」的現象，亦即川崎造船所、三菱財閥和淺野財閥等，為了減少原料籌措的風險和降低成本而新投入鋼鐵業。

由於新廠設立和既有企業擴充設備，鋼鐵的生產結構為之一變。在大戰前夕，日本鋼鐵業可以說是官營八幡製鐵所的天下，但大戰以後因為民間企業的急劇擴張，所以官營八幡製鐵所在一九二〇年代初期的粗鋼生產能力只佔總生產量的二十九·六%。

這種始於海運業的產業連鎖效果，亦波及到機械製造業和電氣機械工業。而染料業和工業藥品業方面，則由於進口替代的成功和纖維工業的發展（與出口擴大有關），需求亦增加，化學工業方面的企業乃因此勃興。

大戰後，隨著前述隔離效果消失，興隆的重化學工業面臨苦難之秋。在一九二〇年代前半，最重要的產業乃是電氣事業，電氣事業的發達則肇因於第一次大戰期間的都市化與重工業化。在工業地帶，對於電氣的需求增加，導致電力不足、電費上漲的現象，於是大規模的水力開發和大容量而遠距離送電的投資計劃開始登場。並且在戰後初期進口所需要的發電機器。到一九二〇年代後半，由於外資所引進的較進步的生產技術已經見效，電氣機械工業乃能自行製造電動機和發送電機器，以取代進口；而且降低其價格，間接降低了生產成本和提高資本效用。當時與外資合作的電機企業，主要為東京電氣、芝浦製作所、三菱電機（三菱財閥）、富

士電機等公司。

除了電機業之外，外國資本投資的領域尚有汽車工業、輪胎業、石油精鍊業等。來自美、英等先進國的技術，逐漸經由外資而移轉到日本，移轉的方式則是訓練日本的技術人員與勞工，促進日本汽車零件工業的發展，奠定了汽車工業穩固的基礎。

相形之下，造船業則由於大戰結束所導致的海運不景氣而面臨困境。在一九二〇年代，美日兩國皆發生經濟恐慌，由於世界貿易縮小，海運量減少，於是對船舶的需求減少，發生供給過剩的現象。造船業的不景氣波及到鋼鐵業，對於鋼鐵的需求減少，但即使如此，由於原本的生產有限，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日本，鋼鐵仍然是供不應求，不足的部份則依賴進口。當時以日本鋼管會社為首的民間鋼鐵企業和官營製鐵所都設法改良設備、降低原料價格。降低原料價格的方式之一，是從印度、中國東北鞍山鐵礦進口生鐵，追求規模經濟，提高國內生產量。

鋼鐵業的原料，來自中國東北，意味著前述三環節貿易的實質存在。棉業的情況更明顯，也因此產生了巨大企業，只是這些企業原本有其自己的脈絡，不屬於「財閥」。

日本棉業的投資中國始於馬關條約之後，在二十世紀初期以後更紛紛成立「在華紡」，在中國大陸生產棉紗，以供給中國織布之用，所以過剩的中國棉花（農民不再將棉花織成布），乃能經由日本商社出口到日本，供應日本棉紡紗業。換言之，日本大紗廠利用其資力和日本商社的合作，壓抑了中國資本的棉業發展。而在大正時期，日本國內的棉紗生產亦逐漸集中於三

大公司：東洋紡績（一九一四年三重紡績和大阪紡績合併後成立）、大日本紡績（尼崎紡績於一九一八年合併攝津紡績而成立）和鐘淵紡績。

三大紡以大規模生產和雄厚的實力為基礎，在與棉花商人交易時，擁有議價上絕對的優越地位。並且他們除了內需的一般棉紗外，兼營織布、出口用良質手紡棉紗；顯示出高度壟斷市場，故其純益率即使在一九二〇年代亦達三十%以上（鐘淵甚至在一九二一年高達一〇六%，最低則為四十四%）；於是把因此產生的過剩資本投入「在華紡」和人造絲工業。結果，「在華紡」由於中國棉業的反彈，逐漸成為中日對立的重要舞台；人造絲工業方面，三大紡利用關稅保護政策，來取得與進口品競爭的優勢。

不僅如此，三大紡由於獨佔日本國內棉紗生產，故能操縱棉紗售價，使經營棉織布的中小企業在原料棉紗高昂的情況下，只能以壓低工資的方式來求生存空間。即使曾展開原料棉紗低廉化運動，也因三大紡的抵制而告失敗。如此，無論是重工業或輕工業，巨大企業的屹立都直接連結著市場寡佔的因素。

總之，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由於國際經濟情勢的改觀，日本一時未能調適，所以一些重化學工業和商業及服務業，曾呈現不景氣的現象；但是電力事業，與外資提攜的新興產業和纖維工業，卻逐漸成長。直到一九二九年才發生整體景氣後退的情形，一九三〇～三一年，名目CPI的減少率高達九%，達到了經濟恐慌的高潮時期。

對世界經濟史而言，一九二九年是個重要的年代，對日本經濟史而言，更是個重要的年代，因為在這一年的日本不但受到世界經濟恐慌的波及，國內本身更發生了「昭和恐慌」。在七月，由於行政處分張作霖暗殺事件，民政黨的濱口雄幸取代田中義一組閣，以黨外的井上準之助為大藏大臣（財政部長）。重新於一九三〇年一月實施金本位制；並且提倡愛用國貨與節約消費，企圖減少輸入和內需（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大戰發生以後，英國首先中止金輸出，意味著國際金本位制的停止，歐美和日本繼之，日本於一九一七年九月脫離金本位制），結果造成物價劇跌的情況。政府開始採用產業合理化政策，產業界因此組成各種同業聯盟（cartel）。

「九一八」事件以後，擔當財政的高橋是清，再度禁止金輸出，採取「低匯率、低利息、財政膨脹」的政策，使輸出增加，景氣回復；民間則除了既有的四大財閥外，又出現了新興財閥，展露出重化學工業的新面貌，汽車工業和飛機工業、電機工業也引進科學性的管理法，開啟日本工業史的新頁。

本書以大眾文化的敘述為主，此文化的產生與當時經濟發展息息相關；也意味著大正時期民間一般「物質文化」與「消費文化」的出現，乃是社會與經濟面貌的寫照。作者經由深入淺出的描繪，重現了兩大戰期間日本庶民的生活史，字裡行間中也流露出一種今日日本文化傳統的多樣性，敘述精采有趣，非常值得一讀。

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托邦時代

前言

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日本正進行著國家未來走向的議論。到目前為止，日本人普遍視民主為日本復興的象徵，其內容則是過勞死、單身赴任、免費加班等所代表的猛烈勞動。即便如此，民眾的休閒時間還是有所增加，我們在倉促的經濟與倉促的休閒間的競爭中，以媒體為媒介，確立了大眾文化。

以現代日本的動畫、漫畫，以及電動遊戲、日本料理、室內設計、音樂等為象徵的大眾文化，被視為是相當新潮的，不只是海外廣大的孩童與年輕人，在成年人間也博得極大人氣。對日本大眾文化中所表現出的文化、美感、創造力，以及對日語關心的人不斷增加，使日本成為軟性權力的大國。對於現代的「日本風潮」(Japonism)現象，美國的道格拉斯·麥葛瑞(Douglas McGray)指出：「一九九〇年代的日本，在文化面上，成為新的超級強權。」他更模仿國民生產總值(GNP)·稱呼日本的「文化力」為「Gross National Cool·GNC」·也就是「國民總魅力度」的意思(《日本經濟新聞》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二日)。丸紅經濟研究所根據道格拉斯的說法，將「GNC」作為文化產業市場，統計其規模。